

# 狂欢视野下的怪诞世界 ——试析《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

河南大学 陈辉

**摘要:**霍桑在《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中借用了典型的狂欢场景，再现了狂欢世界中的怪诞形象，但透过狂欢的群体构成和阴郁的人物色调，可以窥见他对狂欢节的否定态度，这与巴赫金对狂欢节精神的拔高有着本质区别。小说摒弃了狂欢精神的应有之意，借狂欢节形式突显了一个怪诞的异己世界，展现了主人公孤独的心灵之旅。显然，霍桑站在自己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赋予了狂欢化特定的含义。

**关键词:**狂欢场景；怪诞形象；狂欢精神；异己世界；孤独的心灵

**作者简介:**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电子邮箱：mk86@163.com

## 1 引言

《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 1832）是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创作的短篇小说，故事设定在独立战争前夕的殖民地时期，讲述了乡下小伙子罗宾进城寻找亲戚莫利纳上校，却屡次受挫的经历。小说中印第安人装扮的狂人怪物，喧嚣的乐器声，游行队伍的哄笑声，上校被插上羽毛、涂上柏油受辱，罗宾的傻子形象等营造了典型的狂欢场面。事实上，霍桑着迷于新英格兰历史和旧有习俗、典故的书写，在不少作品中都涉及狂欢场景，如《欢乐山的五月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 1836）、《牧神雕像》（*The Marble Faun*, 1860），而《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中的狂欢对小说主题的揭示尤为关键。对本篇小说中狂欢场景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作为美国民族独立的隐喻<sup>①</sup>，即肯定小说中狂欢化代表的颠覆性力量，认为上校作为英国殖民官员，对他的羞辱和驱逐，象征着民众对上级、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权威的反抗，二、嬉闹的众人轻佻、没有节制，沉溺于异教徒式的世俗享乐，但虚幻的欢乐终将被严峻的现实取代，灾难和死亡会接踵

而来 (Yates, 1955) ; 三, 将文本置于霍桑身处的 19 世纪的历史语境中, 认为故事虽然设定在遥远的 18 世纪, 狂欢场景中的暴乱却影射了 19 世纪内战前美国人的焦虑, 即对国家分裂、民主、群众暴乱的恐惧 (Alkana, 2007)。显然, 第一种阐释受到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影响, 将狂欢化视作理想的、积极的民主力量的表现, 第二种阐释认为受清教主义重责任、轻娱乐的思想影响, 作者势必会对“异教徒”的狂欢持否定态度。第三种阐释则是着眼于挖掘作者所处历史时期的集体意识, 与第一类一样是一种政治隐喻。这几种阐释各有侧重, 对加深文本的理解和拓宽读者的视野, 具有启示意义, 但它们偏重对狂欢化意义的追寻, 缺少对狂欢化具体形式和内容的分析, 有判断先行的嫌疑, 或仅仅止步于对莫利纳上校作为“替罪王”的脱冕和对游行队伍首领作为“暴动王”的指认 (尚晓进, 2012: 94)。本文将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 具体分析霍桑在《我的堂叔, 莫利纳上校》中对狂欢化形式的借用和偏离, 以及这种偏离对于小说主题的意义。

## 2 狂欢的群体构成

作为对苏联专制意识形态的反拨, 巴赫金的诗学理论, 如对话理论、狂欢化诗学, 无一不显示出强烈的民主性和社会性。狂欢化诗学, 暗含其对话理论的精神, 实际上通过对狂欢节这种民间节日的颂扬, 强调不同阶级的对话, 尤其是平民与官方的交流, 以对抗现有权力和真理的专制。因此, 巴赫金对全民性的狂欢, 对平民在狂欢节中展露的颠覆性力量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相比之下, 霍桑对狂欢节的态度要暧昧、消极得多。叶茨 (Yates) 指出, 在描述罗马狂欢节时, 霍桑的赞扬态度带着贬损的意味, 他说, “在二十岁之前, 它还较令人愉快” (Yates, 1955: 67)。在《欢乐山的五月柱》中, 众人无忧无虑的舞蹈、欢娱与清教徒严肃、阴郁的生活方式对照, 在霍桑的笔下显露了一抹亮色, 如果说这是霍桑在一定程度上对世俗欢乐的肯定的话, 他对《我的堂叔, 莫利纳上校》中狂欢人群的态度, 在莫利纳上校被折损而仍不失高贵的形象对照下, 无疑是否定的。按照美国独立隐喻的阐释, 罗宾的成长隐喻着民族的独立, 众人则隐喻着独立战争前的“革命的人群”, 这与作者对众人的否定态度显然矛盾。事实上, 20 世纪 70 年代评论家已经无法忽视这种独立隐喻背后的矛盾性了 (Shaw, 1976: 560—561)。

笔者认为, 就《我的堂叔, 莫利纳上校》而言, 霍桑的立场很鲜明, 因为游行队伍鱼龙混杂, 外国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文中不能等同于人民, 更不是正面力量的代表。

小说提到,罗宾在酒馆问路时,看到一个长相怪异的人,在小酒馆(老板为法裔移民)门前,跟一伙“打扮怪里怪气的人”窃窃私语(Hawthorne, 1995: 426);他再次碰到这人时,“此人大步流星,似有要紧事”,说话声音“深沉生硬”,他就是游行队伍的领袖。罗宾还两次碰到一小群形色匆匆的男人,其中有的人服装怪异,哇哩哇啦的话罗宾一句也听不懂。通过下文可以得知,这群人正赶着去参加集会,对他们的言语,皮特·肖(Peter Shaw, 1976: 571)倾向于认为是一种暗语,类似于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中人们的做法,而黄建人直接译为“他们说的外国话”。笔者认为这种翻译有其合理性,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是一群外国人<sup>②</sup>。朱振武(2010: 24)主编的译本在注释中提到,罗宾“迎面遇上的城里人不仅说的是相对比较古老正式的英语,而且很有可能是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清教徒,所以可能会使用荷兰语、法语等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显然也倾向于将这群人看作外国人。奇怪的语言、奇特的装扮可以是秘密集会时的暗语和伪装,也可以是外国人的特征。诺尔特(Nolt, 2002: 29)指出,在18世纪的北美,民族身份不是政治界定的产物,而是由一个人所说的语言决定的,语言是确立一个人民族身份的中心指征;因此,当时英国报纸极力想教德国人说好英语以同化他们,但掌握英语的德国人也不免带有浓重的民族口音。而且,相貌无法伪装,奇特的相貌有可能是异种民族的标志。在罗宾眼中,领头人长相怪异,他额头凸出,较常人宽一倍,中间还凹了进去,头上像鼓出两个大包。鼻梁宽阔、眼窝深陷,这样的形象在文中被反复强调。更重要的是,与罗宾交谈的绅士,认识那位领头人,他把街上的嘈杂声解释为“有三四个从国外来的家伙在吵吵闹闹”(Hawthorne, 1995: 560),这证实了这群人的外国人身份,是他们在游行中起主导作用。

实际上外国人领导的暴动并不少见,于1688年加入新英格兰自治领的纽约便出现过外国移民领导的暴乱,如莱斯勒事件<sup>③</sup>(Leisler's Rebellion, 1689)。这次暴乱由德裔移民莱斯勒领导,他赶跑了总督,自己出任新总督,但始终未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最后被逮捕,处死。从时间上看,莱斯勒事件与小说开篇提到的总督被逐事件同步,大概都发生于自詹姆斯二世1685年即位到接下来的40年间。另外,历史上的纽约多民族特征显著,聚集了来自瑞士、荷兰、法国、德国、苏格兰等地区的多个民族,他们聚族而居,依托地理条件建立了带有鲜明区域文化的社区,以致派系林立,一些民族的局部利益常与总督的权威起冲突;代表特定民族利益的殖民议会的议员,常为此与总督讨价还价,这让纽约出现了类似于小说中的“总督时常与议员们争执不休”(同上, 1995: 551)的局面(Foner, E. & J. A. Garraty, 1991: 728)。虽然霍桑将小说的情节设定在18世纪初新英格兰的某

个小镇，至少在时间上让文中的暴动与莱斯勒事件撇清了关系，但纽约地区的民族冲突无疑为我们解读小说提供了参照，外国人领导的暴动确实存在过，在小说中也完全有可能存在。

如果说，莱斯勒从未得到英国人认可的话，文中的这伙外国人也未得到作者霍桑的肯定。在小说中，这拨外国人是骚乱之源，扰乱了社会的安定局面，在羞辱莫利纳上校时践踏了人性尊严；这群人在罗宾看来，活该被戴上足枷，是一群目无法纪的家伙。那位绅士，有见识，有修养，把街上的吵闹声解释为有三四个家伙在闹事，在他看来，真正闹事的只是一小拨人，这与文中的描述相呼应：“四面八方一扇扇窗户哗的拉开，探出许多乍离枕头的脑袋[……]人们相互询问，这吵闹怎么回事，可谁也答不上来。”（Hawthorne, 1995: 561）显然，许多居民是被喧嚣声吵醒，糊里糊涂地去凑热闹的，游行队伍看起来庞大，但实际上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那位绅士作为唯一正面的城中人，一直游离于游行之外，之后混迹于游行队伍中的妓女、酒馆老板等人，让游行队伍更有乌合之众的嫌疑。

另外，不少评论将文中的游行看作暴动，认为霍桑认可对英国统治的革命，但反对没有节制的革命，即所谓的群众暴动。虽然如此，暴民和人民只有一线之隔，是一个词的两面。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建国初期，政治家们在思想、道德上会利用人民的名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实际的权力分配中，往往蔑视人民的作用，认为由于品质缺陷、性情不稳、缺少知识、信息缺陷等原因，“人民不能理解和维护自己的自由”，“反倒会导致可怕的暴政”，“对权力构成真正的威胁”（李剑鸣，2009: 120）。其中汉密尔顿发表过臭名昭著的言论：“你的人民，先生，是一只猛兽。”（“Your people, sir, is a great beast.”）深具民主意识的杰斐逊也认为人民大众远没有执政能力，需要教育来提高政治和社会觉悟（Horton & Edwards, 1974: 96—103）。这些认知认为，人民一旦进入真正的政治领域，十分容易变身为群氓或暴民，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品质，自由、平等的道德内涵与这样的人民无缘。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也认为必须“抵制暴民”（Conn, 1989: 194），以反对爱尔兰移民要求分享政治权力、黑人要求自由、女性要求选举权和财产权的呼声。他对暴民的定位在今天看来带有明显保守的政治倾向。

不管文中乌合之众式的游行队伍是不是对独立战争前期小写历史的书写，也不论这群乌合之众是不是霍桑对“外国人”、“人民”作为“暴民”的有意建构，小说中的狂欢人群与政治家们对“人民的暴政”的定义不谋而合，即“一群不受节制的乌合之众的愤怒和狂暴”，免不了“攻击、毁谤、愤怒、谋杀、屠戮”等（李剑鸣，2009: 120, 125）。可以说，小说中的游行队伍是一股破坏性的消极力量，

无法代表巴赫金推崇备至的自由的、欢快的平民精神,作者在文中对其态度是否定的。

### 3 狂欢世界和怪诞风格

由于狂欢节蕴含丰富的民间诙谐文化形象,怪诞风格是狂欢节的一大特色,这往往体现在游行人群怪异的形象和荒诞不经的言语、行为上。在《拉伯雷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巴赫金对各种怪诞风格的定义做了梳理,列举了平斯基、默泽尔、施莱格尔、雨果等人的看法,归纳一下,怪诞风格不外乎为倾向于“偏离审美规范,打破自然比例”,或将“相互排斥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具有夸张性、漫画性和讽拟因素[……]也许是奇思妙想,显得滑稽可笑,然而它却蕴涵着巨大的能量”(巴赫金,2009:38—57)。一般而言,夸张性是怪诞风格的显著特征,而狂欢节的怪诞风格还包含物质—肉体性、双重性、诙谐性等因素。在狂欢的世界中,怪诞的人体形象往往偏离肉体规范,如巨人、侏儒、摩尔人、黑人等形象,或对人体器官极尽夸张,如大张的嘴巴、鼓凸的眼睛、大腹便便的肚子等,或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如怀孕的老妇(同时体现了生育和萎死),以及杂糅人形与动、植物形态的形象,如人首马身、戴着动物面具的鬼怪等;在语言上,狂欢节广场的语言往往采用降格的语言游戏,如骂人、诅咒、指天赌咒、插科打诨等,将辱骂与人的身体联系起来,或故意将宗教、道德等神圣、理想、抽象的事物与吃喝拉撒联系起来,使之肉体化和世俗化。<sup>④</sup>怪诞的形象和语言能通过滑稽可笑的方式,帮助人们摆脱通行的真理和习见,“使之能以新的方式看世界,感受到一些现存事物的相对性和有出现完全改观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同上,2009:40)。狂欢节的怪诞风格深刻影响了以后的文学传统,而浪漫主义怪诞风格显然保留了狂欢节起源的某些形式,如假面、疯癫、傀儡等母题(同上,2009:45—56)。霍桑作为美国哥特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在《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中,借用了狂欢节的某些形式,并展现了与狂欢节精神大相径庭的怪诞风格。

在狂欢节广场上,人们摆脱了生活的严肃性和等级、地位的差别,可以相互取笑、狎昵,不拘礼节,自由自在,甚至猥亵也被许可。这与小说中的场面不谋而合。罗宾问路时,先后碰到了戴假发的老绅士、酒馆老板、穿红裙子的妓女和守夜人,这些人在游行队伍拥到街上时,一一出现,且不拘形迹。游行队伍中,人们作印第安人打扮,化装成狂人怪物,而酒馆老板将白围裙顶在头上,老绅士将“睡帽推到脑后,丝袜挂在腿上”(Hawthorne,1995:562),妓女则趁着混乱,在罗宾

胳膊上拧了一把。老绅士衣冠不整，狂笑不止，完全没有之前戴着假发，拄着拐杖，以“上等人”自居时的威严派头。至于红裙妓女，没有狂欢的背景，她的那种大胆行为，在18世纪的新英格兰是难以想象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10: 63）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的第1卷中提到，当时美国清教徒在两性问题上实施严刑峻法，单身男女之间打情骂俏被严厉禁止，违反者会受到罚款、鞭刑这样的处罚。实际上，这位妓女（确切地说，疑似妓女）在日常生活中小心翼翼，拉着罗宾招徕生意时听到邻居开门便吓得逃进家门，而且她住在一栋二层的小楼里，一楼据罗曼（Loman, 2011: 351）推断是一家杂货店（a shop for petty commodity），小店显然有掩人耳目的作用。可见，这位妓女平时表面上谨言慎行，而游行场面提供的混乱和喧闹让她可以在守夜人和众人的眼皮底下肆意违背日常的行为礼法，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在狂欢的背景下，《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展现了鲜明的怪诞风格，这主要体现在其怪诞的人物形象以及语言上，它们与巴赫金式的狂欢节形象类似，但精神已然迥异。文中反复出现的几个人物，如老绅士、酒馆老板、妓女、领头人，无一不透着怪异。首先出场的是老绅士。这位戴假发的先生每走一步就哼哼两声，听起来十分阴沉，让罗宾不由联想到“冰冷的坟墓”（Hawthorne, 1995: 552），哼哼声显然是身衰体弱、身体有病的标志，冰冷的坟墓意味着死亡。这与狂欢节的怪诞人物形象有相似之处，因为后者往往以夸张、过分的方式展现表现“死亡和诞生、生长与形成，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成态”，选择的人体多处于婴儿或老年时期，因为它们最接近母腹/诞生处/生、坟墓/归宿地/死（巴赫金, 2009: 27—34）。文末老头在阳台上狂笑，“笑得浑身乱抖”，“笑容印在他严峻的面容上，好似墓碑上滑稽的铭文”（Hawthorne, 1995: 562），笑声中还夹杂着阴沉的哼哼声。乱抖的身躯、肆无忌惮的狂笑与严峻的面容，笑与铭文的意象都构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了一种滑稽、怪异的效果。其中，阴沉的哼哼声、坟墓、铭文只有单一的指向，即阴冷的死亡，生的意义是缺失的。比较而言，狂欢节的怪诞风格具有双重性，死亡和诞生如同孪生子，是世界生生不息的一部分，可以相互转化。对照之下，老头的形象死气沉沉，缺少生机，显得怪异而阴冷。

其他的人物形象，也趋于怪异和夸张。酒馆老板是法国移民的后代，他法国式的彬彬有礼和带有口音的尖锐嗓音，在罗宾看来很不自然。穿着红裙的妓女，因为裙子被裙环撑得老大，看去“就像站在一只气球上”（同上, 1995: 556）。游行领袖首次出现时，外表触目惊心。他“额头凸出超出常人一倍，正中一条沟纹”，“鼻梁比一根手指头还要宽”（同上, 1995: 553），“眼睛好似深洞里的两团火”。描写额头、鼻梁、眼睛时，除意象外，使用了比较级，说明领头人的外表偏离常规，

趋于丑陋和怪异,而“怪诞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丑”(巴赫金,2009:50)。除怪异之外,领头人的形象还与可怖的魔鬼意象联系起来。在罗宾的眼中,他黑红的脸颊如同两个魔鬼,“一个火神,一个夜神[……],组成阴间才有的怪相”(Hawthorne,1995:557),黑红的脸颊实际上是游行领袖将脸涂成黑色和红色,如同戴着双色的面具一样。

作为狂欢重要道具的面具,霍桑在《欢乐山的五月柱》中有更具体的描绘:人群在山林中载歌载舞,有的戴着动物面具(模拟鹿、恶狼、公山羊、熊等),有的人长着奇长的红鼻子,有的张着血盆大嘴。狂欢节中的假面,本意在于“表现生活的不可穷尽性和多姿多彩”(巴赫金,2009:46),并通过打破自然界限,实现对同一性、单一性的否定。而对清教传统而言,面具象征魔鬼崇拜,代表众人的罪恶,对霍桑而言,面具跟各种华丽的露天盛会一样,意味着欺骗和虚妄,总会被严酷的现实击溃(Yates,1955:68—69)。在本篇小说中,假面同样意味着遮掩、欺骗,阴郁色彩浓厚。领头人化妆后的大嘴几乎咧到耳朵根,显然是一副喜剧面孔,带着永远的笑意,这与他的实际行为相反:他带着众人给莫利纳上校涂上柏油和插上羽毛,对上校实施私刑,领头人代表的无疑是暴力和死亡。阿尔卡纳(Alkana)认为领头人涂抹的黑红面孔可能意味着将非白色人种(黑色和红色人种)从社区中驱逐出去(Alkana,2007:16—17),这一论断从侧面反映了面具隐含的暴力性。而在罗宾看来,领头人的双色脸颊透着诡异,令人恐惧,这一感受至少被提及了三次。

另外,狂欢节式的语言在小说中也经历了变异。罗宾问路过程中碰到的几个人,包括老绅士、酒馆老板、领头人,无一例外地对他进行了语言威胁或辱骂,受此经历影响,罗宾在喧闹的人群中,也感到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敌意。而在狂欢节语言里,包含语言斗殴(辱骂、诅咒、嘲弄、揶揄等),它偏离严肃语言,跟殴打一样,本意在于不拘礼节,摆脱一本正经的日常规范,具有创造的、欢乐的、节日的性质。此时,孩子可以说“你死吧,父亲先生”(巴赫金,2009:285),而不受责罚。文中老绅士认为罗宾拉扯他的衣角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威胁送他入狱,酒馆老板则念着墙上的悬赏告示,故意暗示罗宾是逃跑的契约仆人,威胁着捉他回去,领头人被罗宾拦着去路时,骂他是傻瓜,威胁要揍他。对罗宾这位老老实实在的问路人而言,威胁的言语突如其来,伴随着强烈的恶意,令人莫名其妙。而且老绅士和酒馆老板的语言威胁,诉诸于官方权威、法律规定等权力手段的实施,与狂欢节语言的平民性和诙谐性精神,显然相悖。

#### 4 怪诞的世界：孤独的心灵之旅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霍桑在《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中，在形式上再现了典型的狂欢化场景，在精神氛围上却使之蒙上了怪异、恐怖的色彩。这种怪诞风格与狂欢式的怪诞风格在精神上已经大相径庭，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展现的是一个欢快、光明、无所畏惧的怪诞世界，它“只有以滑稽怪物形式出现的恐怖，即只有已被诙谐战胜的恐怖”（巴赫金，2009：45），那么本篇小说中的怪诞风格呈现的则是一个阴暗、恐怖、可怕的世界，“它仿佛是一种独自体验并强烈意识到自身孤独性的狂欢节”（同上，2009：43）。这种风格实际上就是巴赫金所提到的浪漫主义的怪诞风格，一种“主观的、个体的世界感受的形式”（同上，2009：42），它是狂欢式的怪诞风格发展到近代后的一个变异。

可以说，罗宾面对的就是一个“敌对的、陌生的、非人的”（同上，2009：56）怪诞世界，小说呈现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主观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令人恐惧的。在一个陌生的、充满威胁的城市里，罗宾失去父母故乡的保护、宗教的皈依，城市里唯一的亲戚莫利纳上校自身性命难保，这一切让罗宾成为一个赤裸裸的个体，没了束缚也丧失了安全感，剩下的只有个体对“自由”的恐惧，这一恐惧感在罗宾见到堂叔被辱，随着人群大笑时显露无疑。不少评论承认罗宾的笑令人费解，有学者则认为这表现了罗宾对堂叔代表的父辈权威有意、无意的反抗或背叛（Abrams, 1979：342）。实际上，在游行队伍的喧闹的笑声中，罗宾的笑是疏离、怪异的。如果说狂欢式的笑是社会性的、全民性的，是欢乐、喜庆的笑，是“整个人<sup>⑤</sup> [……]用思想、感情和肉体一起演出和体验的”（巴赫金，2009：56），展现了人与世界亲密无间的话，那么罗宾的笑混合着痛苦，是肉体对自身精神的背离，透露出与狂欢人群的格格不入感：他在人群中一直能感受到周围人的眼光和敌意，游行首领似乎在盯着他，守夜人、妓女在嘲笑地看着他。他在大笑后，没有融入人群，反而紧紧抱住石柱，似乎害怕自己被众人的洪流冲走一般。这也能解释罗宾为什么在最后脸色灰白，语气冷淡，透露出对城市生活的深切厌倦。他并没有被游行队伍同化，对城市的拒绝，表明了他对所处世界的敌意和失望，因为个人与这样的异己世界是无法和解的，“与世界和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也是在主观抒情的层面上，甚至或是在神秘的层面上”（同上，2009：45）。在小说结尾，即使罗宾在绅士的引导下，能留在城市并走向自立，这种希望也是渺茫的。

霍桑展现在人前的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对世事百态冷眼旁观的作家形象，在萨拉姆度过的12年（1825—1837）籍籍无名、孤寂写作的日子，让他对孤独有着独特的体验和认知，他的短篇小说如《罗杰·麦尔文的葬礼》（*Roger*



*Malvin's Burial*, 1832)、《好小伙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 1835)、《教长的黑面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 1836)、《韦克菲尔德》(*Wakefield*, 1835)呈现了一个个孤独者的形象,传递了“人生而孤独”,“孤独销蚀人心是一种罪恶”(黄建人, 2001: 11)的思想,评论者如牛顿·阿文(Newton Irving)更将他的短篇小说看作孤独者要“与世界对话”、“与他人交流的渴望”(同上, 2001: 19)。《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中罗宾的孤独者形象反倒鲜少有人提及,或许因为以上几篇小说中的孤独感是主人公自我封闭的结果(由于“罪”意识等原因),而罗宾的孤独是被迫的,是异己世界强加给个体的孤独。不管怎样,罗宾的孤独感显而易见,文中的怪诞风格强化了他作为个体的恐惧感,而这种怪诞风格又是他孤独地面对异己世界之感受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霍桑在小说中借用了典型的狂欢形式,丰富了文本的同时,又加入了近代人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让小说蒙上了一层独特的怪诞色彩。“孤独的心灵之旅”的主题势必让他的借用离开狂欢的精神实质,而只留下狂欢的外壳。狂欢化是理解《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的一把钥匙,但霍桑的狂欢场面承载了更多的负面意义,这与巴赫金对狂欢化的拔高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的构建,或许不是对狂欢化的否定,而是如巴赫金所言,是狂欢化本身的蜕化。在狂欢化的近代发展过程中,霍桑站在自己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赋予了该形式独特的意义,并展示了个体面对世界的生存感受。

## 注释

① 尚晓进(2012: 95)在《霍桑与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一文的注释中指出,李维斯(Q. D. Leavis)最早将《我的堂叔,莫利纳上校》视作“美国成年”的故事,认为莫利纳上校代表英国殖民统治,而罗宾是年轻的殖民地的化身,罗宾的成长故事由此被看成美国走向民族独立的政治寓言。

② 殖民地时期英国移民占统治地位,是数量最多的民族群体(梁茂信, 1996: 27),外国人这里是相对于英裔美国人而言,指移民到北美殖民地的其他民族,如德国、爱尔兰、法国、瑞典、挪威移民等。他们在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上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如1797年的一位波兰贵族发现,马里兰地区的德裔美国人,移民已历经几代人,但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德国服饰(Nolt, 2002: 14—21)。

③ 莱斯勒事件牵涉复杂的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经济利益的争夺,以及个人恩怨。莱斯勒虽是德裔移民之子,但因与一富孀结婚,得以与纽约的荷兰望族联姻,并投资于皮毛、烟草、酒等行业,成为殖民地的大商人,但因种种原因并没有被荷兰上层接纳,他后来实

际上遭到英国官员、荷兰贵族和荷兰神职人员的联合绞杀。在该次暴乱中，莱斯勒实际上代表的是荷兰中下层移民（如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的利益。参阅巴尔末（Balmer, 1989）。

④ 详情请见巴赫金对民间诙谐文化形象体系中的怪诞现实主义（巴赫金, 2009: 11—40）以及对拉伯雷作品中狂欢节要素的分析（同上, 2009: 226—279）。

⑤ 强调标记为原文所有。

## 参考文献

- Abrams, R. 1979. The psychology of cognition in “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 *Philological Quarterly* 58 (3): 336—347.
- Alkana, J. 2007. Disorderly history in “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53 (1): 1—30.
- Balmer, R. 1989. Traitors and papists: 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Leisler’s Rebellion. *New York History* 70 (4): 341—372.
- Conn, P. 1989. *Literature in America: An Illustrate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ner, E. & J. A. Garraty. 1991.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Hawthorne, N. 1995. 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 In Nina Byam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1 (4th ed.).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551—563.
- Horton, R.W. & H.W. Edwards. 1974.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 Loman, A. 2011. More than a parchment three-pence: Crises of value in Hawthorne’s “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26 (2): 345—362.
- Miller, J. N. 1989. The pageantry of revolt in “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17 (1): 51—64.
- Nolt, S. M. 2002. *Foreigners in Their Own Land: Pennsylvania Germans in the Early Republic*.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Tocqueville, A. 2010. *Democracy in America* (J. T. Schleifer, tran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 Shaw, P. 1976. Fathers, sons, and the ambiguities of revolution in "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49 (4): 559—576.
- Yates, N. 1955. Ritual and reality: Mask and dance motifs in Hawthorne's fiction. *Philological Quarterly* 34 (1): 56—70.
- 阿文, 2001, 序, 《霍桑短篇小说选》(黄建人编),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7—30。
- 巴赫金, 2009, 《拉伯雷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万海松、钱中文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黄建人, 2001, 编、译者序, 《霍桑短篇小说选》(黄建人编),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16。
- 霍桑, 2001, 《霍桑短篇小说选》(黄建人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李剑鸣, 2009, “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 《历史研究》(1): 110—133。
- 梁茂信, 1996,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尚晓进, 2012, 霍桑与民族主义历史叙事——霍桑历史题材短篇小说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报》35 (5): 90—95。
- 朱振武, 2010, 《胎记——霍桑短篇小说》,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